

No. 8 / 2016

WINTER



Political Philosophy Review

历史境遇中的自由主义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

洪涛 主编

第 8 辑

2016 年

本辑专题：历史境遇中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及其历史 / 埃瑞克·沃格林 著 杨立峰 译 应奇 校

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 杰里米·沃尔德伦 著 唐玉 王莉 译 惠春寿 校

自由主义的虚假胜利 / 约翰·斯科鲁普斯基 著 徐伟 杜春 译 惠春寿 应奇 校

弱国家的自由主义能够生存吗？ / 斯蒂芬·霍尔姆斯 著 杨立峰 译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再考察 / 詹姆斯·T. 施莱费尔 著 宗成河 译

孟德斯鸠与社会学法学 / 欧根·埃利希 著 蔡乐钊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No. 8 / 2016

WINTER



Political Philosophy Review

历史境遇中的自由主义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

洪涛 主编

第 8 辑

2016 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 第8辑, 历史境遇中的自由主义 /

洪涛主编.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ISBN 978-7-208-14296-1

I. ①复… II. ①洪… III. ①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7267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设计 楚 门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

(第八辑)

历史境遇中的自由主义

洪 涛 主编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 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217,000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296-1/B·1247

定价 48.00元

主编：洪 涛

学术委员

汪 晖（清华大学）
赵汀阳（中国社科院）
何怀宏（北京大学）
万俊人（清华大学）
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
陈 来（清华大学）
郭齐勇（武汉大学）
林尚立（复旦大学）
桑玉成（复旦大学）
顾 肃（复旦大学）
陈明明（复旦大学）
刘清平（复旦大学）
张汝伦（复旦大学）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
姚大志（吉林大学）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
李 强（北京大学）
钱永祥（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萧高彦（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慈继伟（香港大学）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
Daniel Bell（清华大学）
包利民（浙江大学）
应 奇（浙江大学）
郁建兴（浙江大学）
秦亚青（外交学院）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
张小劲（清华大学）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
刘 擎（华东师范大学）
白彤东（复旦大学）
洪 涛（复旦大学）
丁 耘（复旦大学）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
刘训练（天津师范大学）

目 录

本辑专题 历史境遇中的自由主义

编前语 / 应 奇 3

自由主义及其历史 / 埃瑞克·沃格林 著 杨立峰 译 应 奇 校 5

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 杰里米·沃尔德伦 著 唐 玉 王 莉 译

惠春寿 校 23

自由主义的虚假胜利 / 约翰·斯科鲁普斯基 著 徐 伟 杜 春 译

惠春寿 应 奇 校 51

弱国家的自由主义能够生存吗? / 斯蒂芬·霍尔姆斯 著 杨立峰 译 78

研究论文

近代法国公民身份的形态变迁 / 郭台辉 105

电影：一种“拉得更近”的看 / 孙 斌 张艳芬 123

思想史研究

关于《利维坦》的一段历史性引言 / 陈 彦 145

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价值底线与政治共识 / 庞金友 张 霞 167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再考察 /詹姆斯·T.施莱费尔 著

宗成河 译 184

国学专论

孔广森与《公羊》之三科九旨 /郭晓东 205

经典与诠释

论东方复兴 /埃德加·基内 著 邓皓琛 译 229

孟德斯鸠与社会学法学 /欧根·埃利希 著 蔡乐钊 译 250

本辑专题

历史境遇中的自由主义

编前语^{*}

应 奇^{**}

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政治哲学，自由主义始终面临着怎样说明其所置身和回应的历史境遇与其承诺和证成的规范内涵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系到怎样从根源上把自由主义与另外两种现代性政治哲学即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又关系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这个暧昧不明的时代的潜在能量和可能前景。

沃格林的《自由主义及其历史》从西方革命运动背景下来考察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变化的自由主义图像。结合宏观的叙事和细微的辨析，他得出了自由主义的两个“不变”——和两个“转变”。教会与国家分离的趋势和宽容的态度，以及对专制法律和精神权威的敌视，是自由主义的两个“不变”；两个“转变”则分别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衰亡和自由主义之被重新赋予基督教内容，通篇呈现出某种灰暗无望、莫知所从的基调。沃尔德伦的名篇《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认为自由主义承诺了一种自由的观念和对

^{*} 本辑专题文章系浙江大学重大基础理论专项课题“公共证成视角下的政治哲学重大问题”的前期成果。

^{**} 应奇，浙江大学哲学系。

个体的能动性和能力的尊重,论证了应当把自由主义表述为一种如何使政治行动具有道德合法性的理论,而这种合法性植根于所有那些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同意。与受困于传统的神秘遗产的保守主义不同,也与动心于自由将会在历史的约定时刻到来的诺言的社会主义有异,“只有自由主义者依然含混不清、踌躇不决地致力于自由在当前情境中的前景和可能性”。文章焕发着道德上的勇气和智识上的自信。斯科鲁普斯基的《自由主义的虚假胜利》把自由主义传统分为四个阶段,即19世纪的早期古典自由主义和晚期唯心主义,20世纪的早期现代主义和晚期中立主义。相比于伦理反思最为卓越的19世纪,采取知识论的分离策略的20世纪自由主义的伦理思想显得单薄、含混和隐晦。文章标题中的Hollow一词既有“虚假”之意,也有“浅薄”“低俗”之义,宛如一曲维多利亚时代的挽歌。霍尔姆斯的《弱国家的自由主义能够生存吗?》通过对俄罗斯的自由化改革的分析,具体而微地展示了所谓国家权力和能力的悖论,一方面,没有征税和支付能力的弱国家无法保护个体权利,另一方面,强国家的自由主义并不是铁腕的自由主义,这是因为,“在自由主义的语境中,‘国家的力量’在本质上依赖于政府获得人们自愿支持的能力。”其思致之绵密、行文之雄辩和道德上之昂扬与自负给人以深刻印象。

就本专题四位作者的学术背景和理论立场而言,大致来说,斯科鲁普斯基似乎与沃格林更具亲和性,而沃尔德伦和霍尔姆斯则都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名家。四文合力,交响奏鸣,一方面呈现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复杂缠绕的理论谱系,另一方面展示了自由主义的规范取向与其历史境遇之间双向的互动关系。究竟是特殊性和分裂性的巨浪会吞噬掉普遍性和整合性的理想,还是普遍性和整合性的力量能够引领特殊性和分裂性于不坠,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专题论文的编译是笔者早年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擘画的《自由主义的历史与理论》译文集的组成部分,这项工作属于浙江大学重大基础理论专项课题“公共证成视角下的政治哲学重大问题”的前期成果;洪涛和赵荔红两位的支持促成笔者把这些译文的校订提上了议事日程,谨此志谢。

自由主义及其历史*

埃瑞克·沃格林 著 杨立峰 译

应奇 校**

概述自由主义的历史，尽管并不繁重，但由于方法论上的原因，却依然有些困难。因为我们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是否存在一个可以被明确定义的、叫做自由主义的东西？如果一个主题不能被明确定义，那么，它是否能够拥有历史？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普遍的方法论难题。例如，汤因比(Toynbee)的伟大著作就肇始于探讨英国是否拥有历史；他的结论是，作为一种社会体，英国这个民族如此紧密地与西方文明社会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不深入研究整个西

* 本文译自 Eric Voegelin, "Liberalism and its History," Mary Algozin and Keith Algozin trans.,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36, No.4, 1974, pp.504—520.这篇文章的原型是沃格林在巴伐利亚天主教院所做的一次演讲，并曾由这个学院出版(Wiinburg, 1960)。编辑对它进行了调整——英文版编辑注。

** 埃瑞克·沃格林，著名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杨立峰，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应奇，浙江大学哲学系。

方文明史,就不可能撰写一部英国史。自由主义应该如何被定义,以及它是否拥有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提出的。它们甚至出现得更加尖锐,因为自由主义的情况要比英国更加复杂。尽管英国的某些历史阶段,比如宗教改革时期,必须放置在和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的普遍历史的关系中才能被加以研究,但依然存在很长一段单独的、特殊的英国历史。然而,在自由主义的情形中,把主题收缩进各个民族社会之中——德国、法国、英国或美国——是很难成立的。因为自由主义的所有地域性形态都只是一个共同的西方运动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这种运动还很难与同时期的其他运动分离开来。

我必须提出这些方法论的问题,因为在过去三十年中,自由主义的形象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如果你翻阅下较早的经典著作,例如圭多·德·拉吉罗(Guido de Ruggiero)在20世纪20年代的著作,你将发现那时候——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期——的自由主义仍然表现为一种很容易被定义的现象。但如果你浏览最近以来的文献,就会发现拉吉罗作品中的那种原型几乎已经消失了——当前自由主义的问题是在更宽广的语境中被提出的。为了找到我们目前研究的方向,让我先简要地考察一下最近的三本著作吧。

首先是慕尼黑历史学家弗朗茨·施纳贝尔(Franz Schnabel)于1934年出版的著作,《十九世纪德国史》(*Deutsche Geschichte in 19. Jahrhundert*)。其中第二卷深入而犀利地讨论了自由主义。在那里,虽然有一章专门讨论自由主义的类概念(type-concept),但这种历史的表述只有在把自由主义放置在和19世纪的其他运动——反动、复辟、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相互竞争的语境中才能描述自由主义的现象。这表明,自由主义并

不是独立的现象；它的本质只有在它和其他现象的对峙中才能被充分描述。

二十年后，到了1955年，约瑟夫·莱克勒(Joseph Lecler)的《宽容与宗教改革》(*Histoire de la Tolerance au Siècle de la Reforme*)出版。这本卓越的专著讨论的是宽容在宗教改革年代的历史，它引人注目地研究了自由主义的态度是如何从宗教冲突中产生的。在两个教派的冲突中，在这两个教派与它们各自国家的冲突中，一种新的宽容的态度逐渐出现了。莱克勒把自由主义态度的开端追溯到之前的讨论基本没有涉及的情境之中，即，从宗教战争的经历中产生出来的对宽容的渴望——由此得出洞见一，基督教王国不可能在两个教派出于教义而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幸存；洞见二，两个教派必须以某种方式在一个社会中共存。

最后，弗里德里希·希尔(Friedrich Heer)在他关于《第三种力量》(*Die Dritte Kraft*)的新作品中，描绘了一条重要的精神史线索，它从16世纪初伊拉斯谟(Erasmus)时代的启蒙运动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代。通过这种“第三种力量”的进路，希尔把一种运动的历史表述为不停地在革命和反动之间，在萦绕欧洲的政治运动的左翼和右翼之间确立一种自由主义秩序的历史。由此产生了一种关于世俗的政治运动的图画，而自由主义是其中一个阶段。

这些简要的征兆展示了自由主义必须与之契合的问题架构已经被描述到什么程度了。围绕自由主义并赋予其意义的境遇，远远超出了人们根据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表述的古典自由主义而得到的普通理解。

二

自由主义的图像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在历史的进程

中发生了变化。而自由主义本身之所以会发生变化,是因为它不是一组关于政治现实的永久有效的科学命题,而是一系列政治意见和政治态度,这些意见和态度在刺激它们产生的境遇中拥有最恰当的正确性,但随后就会被历史所超越,并被要求公平地对待新的境遇。自由主义是西方革命运动背景下的一种政治运动;它的意义随着革命运动的各个阶段而变化。它的领域在 19 世纪最为清晰,在此之后和在此之前,它的清晰性都在降低,这使得它越来越难以确立自己的身份。如果我们能抓住“自由主义的(liberal)”这个措辞的历史和政治起源,我们就能最好地进入这个不断变化的意义领域。

我们已经看到,即便自由主义的起点可以被追溯至 16 世纪早期,“自由主义的”这个词依然是一个相对晚近的产物。它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 20 年代,1812 年西班牙议会的一个党派称自己是自由主义的。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立宪党派,它组成了一个反对复辟的阵线。从此,“自由主义的”这个措辞进入了一般欧洲人的词汇表,随后,出现了遍及欧洲的自由主义团体、政党和运动。

对“自由主义的”这种表述的最早使用表明了自由主义的某些问题。这种新态度如此紧密地与它所反对的那些态度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两者构成的复合体变成了遮蔽其中各个要素的意义统一体。从 1810 年到 1820 年这十年间,出现了与自由主义理念相平行的保守主义理念和复辟理念。通过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的《保守派》(*Le Conservateur*)我们知道了保守主义,而通过哈勒(Haller)1816 年的《政治学的重建》(*Restauration der Staatswissenschaft*)我们知道了复辟理念。十年之间,这三种符号都出现了,并在此后被用来命名那些平行发展、互相关联,并且由于是对革命现象的三种反应模式而成为一种意义统一体的运动和派别。这三种反应模式的意义是通过它们与革命的关系被确定的,因此只有这种语境中,革

命、复辟、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四种标签才能得到理解。

然而,即便获得了这种见解,我们依旧不能像定义一种概念那样清楚地说出这四种符号的意义。因为在历史进程中,这些运动的各种要素都在彼此联系着向前发展,并且不断改变着它们的含义。让我来指出它们意义的一些变化。

首先,如今的“自由主义者”基本等同于“保守主义者”,这诚然是因为自由主义的运动已经被更加激进的新革命浪潮所超越了,而与这种新浪潮相比,自由主义扮演了保守的角色。正如之前的——从1810年到1820年的十年间——保守主义相对于革命和自由主义是保守的一样。例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被问到他的政治态度时回答说,他是自由主义者,即保守主义者。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冯·哈耶克(von Hayek)是自由主义者,即,相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已经超越自由主义的其他革命阶段是持保守态度的人。“老派自由主义者”的原型在今天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

另外一种意义变化发生在美国。在美国政治词汇中,“自由主义的”通常指的不是现在被当作保守主义的19世纪的欧洲自由主义,相反,它指的是一种政治改良的态度(progressive attitude)。大体上来说,人们可以把美国的共和党称作是保守主义的,把民主党称作是自由—改良主义的。但共和党的保守主义恰恰是旧欧洲的自由主义,即,对社会主义和过度国家干涉等的拒绝。而民主党却由于它的纲领向福利国家、国家资本主义倾斜,以及总是强调工会的利益而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意义向左转得如此彻底,以至于经常被当作是“左倾的人”或“同路人”来使用。这种意义变化之所以在美国发生,是因为欧洲老派的自由主义并没有以一种政治运动那样明确的方式存在过,而它之所以没有这样发展,是因为美国没有欧洲自由主义需要面对的敌人。在欧洲自由主义正在浴血奋战的19世纪前半叶,美国并没有被迫和复辟运动、一种残存的君主制原则,或与

国家结盟的政治上活跃的教会做斗争。显然,自由主义可以根据这种社会境遇承担不同的功能,并在意义上有所损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自由主义发生了一种新的引人瞩目的意义变化。如果你考察战后时期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各种政治阵线,你会发现一种在战前从未如此大规模存在过的政治力量:各个主要政党都紧密地与天主教和新教教会联系在一起。通过相互吸收,自由主义与这种新政治力量达成了广泛共识。被革命所超越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保守主义者;而保守的天主教组织在相当程度上对自己进行了自由主义的改造。由此形成了一种针对共同危险的联合战线。不过,社会境遇再次发挥了作用,而且这种发展的方向还不够清楚。当天主教或新教阵营的政党变成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时,持严格的世俗主义态度的自由主义者们可能会更世俗主义,更反教权主义——就像法国的情形一样,由于自由主义的立场被保守主义者占据了,所以他们可能会更急剧地向左转,甚至倒向共产主义的政党,尽管他们并不是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主义扮演了老派自由主义的反教权主义的角色,因为老派的自由主义者们转向了右翼并且变得保守起来,有时还带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

但这也没有穷尽所有复杂情况。我曾经指出,所有符号——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复辟——都只能被理解为对革命的反应模式。在法国,从1810年到1820年的十年间,自由主义占据了革命的符号,使之成为自己的立场。让我们考察下这种意义的转变。1815年,自由主义者查尔斯·孔德(不要与奥古斯特·孔德混淆)创立了《全球》(*Globe*)。孔德在这本期刊中发展出一种自由主义的纲领,它要承担的任务就是永远革命。这种永远革命是什么呢?孔德认为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中存在可怕的社会问题,之所以会发生革命,就是因为没有在恰当的时刻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如果社会正义的要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那么就会出现革命。如果我们希望

未来不要再发生这些恐怖的事件,那么必须在恰当的时刻通过不那么不尽如人意的改革来实现革命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的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必须不断进行下去:用持续不断的、灵活的政治改革赎买革命的恐怖。即便查尔斯·孔德的这种观点改变了名称,但它仍然存在于自由主义政治之中,并且通过 19 世纪的改良的自由主义,变成了现在美国所谓的“和平变革”(peaceful change)。和平变革的理念——根据工业化时代瞬息万变的社会境遇及时改变政策——现在已经变成了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的共同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主义变成了一种采取其他较少破坏性的手段来进行革命的方法。

这种听上去合理而且诱人的自由主义其实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它大大低估了革命背后的动机和力量。事实上,自由主义根本没有赎买革命的恐怖,相反,它被迫在极权主义政权的时代扮演了保守的角色。诚然,查尔斯·孔德正确地认识到,自由主义中存在革命的成分,但这种革命远远超出了自由主义想要的程度。这一点在 20 世纪不断革命的过程中得到了证明。托洛茨基(Trotsky)在近来超越了自由主义的革命阶段中继续使用了这个观点。他是一个敏锐的革命运动的分析家;他知道所谓的革命(无论是今天的共产主义革命,还是其全部意义只能在当前被理解的法国大革命)就是一种运动——而一种运动只能存在于变动之中。彻底的革命者必须把革命带入永久的境遇之中,不能有所妥协,不能安稳于特定的成就,因为一旦允许某种稳定的停滞状态,革命就会终结。要保持革命的活力,人们必须不断地把它进行下去。它在不安动荡中成长,它需要一个永久的对手;它必定要遇到某些会被自己打击并克服的障碍,等等。如果没有了障碍,没有了帝国主义者或异端分子,革命就会由于缺乏攻击对象而终结。革命只有在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时才能结束。这就是托洛茨基在他不断革命的观点中表达的洞见: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并不试图产生一种稳定的